

环境政治学译丛

生态社会主义： 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

[美]戴维·佩珀 著
刘颖 译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山东大学出版社



环境政治学译丛
Environ-Politics

生态社会主义： 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英]戴维·佩珀 著
刘颖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在吸收马克思、莫里斯、克鲁泡特金和无政府—工联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对推动绿色政治和环境运动前进的且富于挑战性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分析。通过确立一种激进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成要素,作者批驳了生物中心主义以及过分简单化的经济增长极限与人口过多等观点,同时也批判了后现代政治和深生态学的绿色方法中的缺陷和矛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英)佩珀著;刘颖译。—2版。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5

书名原文:Eco-Socialism: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ISBN 978-7-5607-2906-0

I. 生… II. ①佩…②刘… III. 社会主义-关系-生态学-研究
IV. ①D033.4②Q1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2321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720×1000毫米 1/16 20.25印张 300千字

2012年5月第2版 2012年5月第3次印刷

定价:36.00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总 序

在当代世界中,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被公认为是人类 21 世纪面临的最富有挑战性的难题之一。传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反生态本质或不可持续性特征已暴露无遗,而同样清楚的是,在从根本上改变智力支撑着现时代的物质主义生存方式的现代化思维模式之前,人类很难找到一条通向明天的现实道路。因而,人类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从未像今天这样需要挖掘与展现我们的理论反思潜能:通过重新思考我们与周围自然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人类作为其中一部分而不是主宰者所应担当的适当角色,来重新构建一种可以使得人类长久地在地球上生存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与工程意义上的生态学或“科学生态学”,而且需要(如果不能说更需要)人文与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或“人文生态学”。沿着上述思路,我们才能正确理解正在蓬勃兴起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大量边缘性与交叉性新学科的意蕴,比如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生态营销学、生态社会学、生态人类学、生态文化学、生态法学、生态文学等等。就此而言,笔者所指称的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也是这些形成中的诸多新兴学科之一。

环境政治的研究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主要集中在生态政治理论、环境运动团体和绿色政党三个层面,但从更一般意义上说,环境政治还可以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比如民族国家政府的环境管治及其政策决



策、环境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组织的跨国环境管治合作及其全球政治参与，等等。因此，从总体上说，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还远未成熟，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需要作深入的研究。

部分是基于环境政治学这门学科本身所具有的不成熟性，部分是基于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自身与时代特点的理解，笔者并不主张急于对环境政治学作出看似明确、实际上很可能制约其发展的界定，而是更愿意将其宽泛地规定为一种政治学视野下思考生态环境问题的新视角。具体而言，这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其一，环境政治学可以大致地规定为介于政治学与生态学之间的一门交叉性、边缘性新学科。依此，我们可以不必像对待传统学科那样过分在意它的学科独立性或“名分”，而是给予其充分的自由扩展与深化空间，这样可能反而更有利于它的学科发展与成熟。其二，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明显是一个具有超出了单一传统学科研究对象归属的“超普遍性”和影响到人类基本价值认知的“深层次”问题，因而，只有以一种超越传统哲学与政治学框架的视野与开放性，才有可能突破原有认知与思维模式的局限，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反灰色的都是绿色的。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环境政治学在中国发展的切入点或突破口应着眼于以下两点：一是要坚持研究方法上的比较政治学观点或方法。这其中既包括不同学科视野下对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比较，也包括世界不同地区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的比较。对于前者来说，对生态哲学研究已有成果的消化吸收，是其他生态环境问题相关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学科的理性元点，环境政治学也不例外；对于后者来说，我们并不认为欧美等西方国家掌握着人类通向绿色未来的真理或“锁钥”，也不认为中国可以回避作为一个当今世界最大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历史责任与创造潜力，但我们的确认为，只有对欧美国家社会与经济生态化发展经验的分析借鉴才有可能成为任何绿色文明与社会创建的现实起点。二是要争取研究成果上尽可能广泛而及时的交流与分享。这其中基础性手段当然是有选择地翻译介绍欧美等



西方国家学者在环境政治学领域的经典性论著，而它对于环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普及和中外学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编辑出版《环境政治学译丛》是在上述两方面意义上的一个尝试，目的是推进环境政治学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呈现给读者的这一统一的“环境政治学译丛”（共12册）是自2005年开始陆续翻译出版的。2005年翻译出版了《绿色政治思想》（安德鲁·多布森）、《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戴维·佩珀）、《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克里斯·卢茨）和《欧洲执政绿党》（斐迪南·穆勒—罗密尔和托马斯·波古特克）。2008年翻译出版了《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默里·布克金）、《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萨拉·萨卡）、《当代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塔基斯·福托鲍洛斯）和《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约翰·德赖泽克）。2012年翻译出版了《绿色国家：重思民主与主权》（罗宾·艾克斯利）、《环境与公民权：整合正义、责任和公民参与》（马克·史密斯、皮亚·庞萨帕）、《全球视野下的环境管治：生态与政治现代化的新方法》（马丁·耶内克、克劳斯·雅克布）和《全球环境政治：权力、观点和实践》（罗尼·利普舒茨）。之所以选择这些著作，一方面是由于它们都已成为当代环境政治著述中的经典性作品或“必读书目”，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分别展现了“环境政治学”、“生态社会主义”、“生态资本主义”等环境政治学整体或某一主要理论与实践流派的最新概貌。

当然，如果没有大量研究基金、学术机构和国内外同行所提供的帮助与鼓励，《环境政治学译丛》在最近几年内的连续编译出版是无法想象的。因此，笔者要特别感谢“中欧高教合作项目”、“德国学术交流中心—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项目、欧盟—中国研究中心项目、德国洪堡基金会、中国留学基金委员会，以及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项目“生态社会主义研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教育部人文社科



研究规划项目“西方绿色左翼政治思潮研究”(09YJA710046)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生态资本主义及其批评研究”(10BKS049)等所提供的主要财政资助。同时,在本译丛的编译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安德鲁·多布森、斐迪南·穆勒—罗密尔、戴维·佩珀、托马斯·波古特克、克里斯·卢茨、萨拉·萨卡、塔基斯·福托鲍洛斯、约翰·德赖泽克、罗宾·艾克斯利、马克·史密斯、皮亚·庞萨帕、马丁·耶内克和罗尼·利普舒茨等提供的各方面的热情帮助,他们为各自著作的中文版撰写了专门的前言,而且萨拉·萨卡先生还对自己的著作作了一些文献资料性的补充与完善。

同样重要的是,我的同事和合作伙伴刘颖博士、徐凯博士、张淑兰教授、李宏博士、蔺雪春博士、郭晨星博士、侯艳芳博士、郭志俊博士、杨晓燕博士、李慧明博士和博士候选人李昕蕾女士等,他们在从事繁忙的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先后承担了本译丛的翻译工作。在此,笔者一并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最后,笔者再次感谢山东大学出版社对《环境政治学译丛》的出版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并真诚地希望,它能够成为我们共同期待的环境政治学研究在中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起点。

郇庆治

2012年4月于北京大学

译者说明

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现代生态(环境)政治学的一个主要思潮和流派,是随着生态(绿色)运动的发展而逐步成长起来的。生态运动作为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主流,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由西方生态灾害和能源危机直接引发的群众性抗议运动。经过70年代的不断扩展后,生态运动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达到一个鼎盛时期。应该说,生态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生态政治理论流派。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像生态运动本身一样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它的基本理论及立场依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顾名思义,生态社会主义就是在社会主义的视角下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的理论阐释与探究,并提出相应的实践解决方案。因而,它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对现代生态学的回应和吸纳,既是当代社会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又是生态(环境)政治学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一书,为我们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分析和应对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视角。在本书中,他从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主要政治意识形态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入手,清晰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思考与应对当代绿色运动提出的生态环境议题的政治相关性。作为本书的主要观点,戴维·佩珀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视角和无政府主义观点等的有机结合,可以成为发展一种独立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并且可以对



生态运动的现实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而，本书无疑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阐述中的经典之作。当然，这既不意味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批评甚或解释都是客观的或准确的，也不意味着译者都同意他所提出的“激进的、连贯一致的生态社会主义”观点。但是，本书毕竟为读者提供了审视当代生态环境难题的系统的社会主义视点和大量有关生态社会主义的丰富翔实的资料，而这些都会对我们认识和研究生态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思潮大有裨益。

对本书的翻译，译者本着求实负责的态度力求忠实于原著，最大限度地保持原著的风貌。但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丛书的体例要求，译者将原著中的参考文献调整为中文比较习惯的章末注释；首次出现的人名、地名和专有名称均在译文中标出了英文或原文，以方便读者阅读；原著中的斜体字在译文中均以黑体字标示。另外，译者对文中的个别表格也作了主要是技术性的调整，比如合并删除了原著第4章中的表格1。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山东大学国际政治专业2003级的一名博士生，我从无译书的经验，加之本书涉及太多的环境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问题与理论术语，因而在翻译本书过程中面临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本书最终可以完稿并得以奉献给广大读者，完全得益于我的导师郇庆治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他不仅解决了我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许多语言“盲区”，而且在承担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之余校对了全书。对此，译者要对郇庆治教授表示深深的谢意。

由于经验不足，书中的错译、误译之处难免存在，敬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译者不胜感谢。

译者

2007年6月于山东大学

中译本前言

当《生态社会主义》一书的中文版即将在它英文首版十一年后面世之际，我们被告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死亡。这一观点认为，它们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已不再具有相关性，其中，围绕工业化与现代化**成果**的阶级斗争已经被由工业化和现代化**引起**的环境与其他风险分配的争论所代替。这些风险的特征是，它们平等地影响所有的阶级。我们可以从东欧和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所犯的**错误**中，看到社会主义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后果——大规模的污染和环境破坏。

尽管上述论点中包含着某些真理性的因素，但它们在总体上是立足于一个极端错误和夸大其词的立场上的。事实上，由于“全球化”（即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以其所有的现代方面与形式的全球性扩张）正在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威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西方学者比如围绕《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形成的一个网络，认识到了这种相关性。正如本书所表明的，他们始于使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它总是动态的并随着历史进程而发展）适应一个 21 世纪全球化世界的环境与条件，包括承认现实世界中物质环境的极端重要性。

这种分析首先是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已证明的关于资本主义如何与为什么**需要**全球化的思想——在空间上扩展并进入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资本主义需要这样做来抵消它运转过程中



的内在矛盾：那些产生不利效果比如生产多于市场可以消费商品的趋势的矛盾。由于这些效果也在剧烈竞争的背景下发生，资本主义绝对需要的劳动者的生活福利与有效工作最终将遭到破坏。而且，随着国家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干预在过去几十年中在世界范围内的退却，这种破坏性进程的结果正在变得日益明显。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来继续描述一种相对较新现象的发生——“生态矛盾”，即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倾向于破坏和贬低物质环境所提供的资源与服务，而这种环境也是它最终所依赖的。从全球的角度说，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正在产生诸如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短缺和造成严重污染的大量废弃物等不利后果。不仅如此，这些难题显然并不是不分阶级的——它们不平等地影响每一个人。富人比穷人更容易免除这些影响，而且更能够在面临危险时采取减缓策略以确保他们自己的生存。

西方政府和那些“发展中世界”的政府也许承认这些事实，但它们的回应一直是不够严肃的，因为担心严厉的环境与社会规范和计划可能对它们的工商业带来影响（比如，美国拒绝《京都议定书》）。相反，它们却编织着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幻想。比如“生态现代化”——一种基于错误假定的环境保护方法——的教义，包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像富裕的西方人那样的生活标准、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是相互促进的而不是相互冲突的等观念。这些假定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一个人道的、社会公正的和有利于环境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可能的，即使在日益加剧的增长与竞争的背景下。但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分析表明，这些前提是错误的：它们事实上是幻想，犯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评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同样错误。也就是说，这些观点未能把它们的分析与描述立足于对资本主义完整过程（这个过程意味着，一个在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体制下面向全球生产的跨国公司不可能充分地回应即将到来的危机信号）的充分与准确理解基础之上。

自从全球性“绿色运动”在西方出现并发出这种危机警告以来，已



经接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目前,这一运动对全球化的批评是强有力的和犀利的,并坚定地主张一种有意义的可持续发展。它较激进的成员已经加入了以“反资本主义”或“反全球化”运动著称的利益团体联盟。这种运动已经对公众意识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却往往是在否定而不是在肯定的意义上。我们知道这一运动所不想要的东西,但对于它**确实**想要的东西却是一幅缺乏内在连贯性的图画。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挑选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在任何反全球化、赞成环境著述或抗议示威中最经常出现的主张。它们包括:

真正基层性的广泛民主;

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即共同体成员所有,而不一定是国家所有);

面向社会需要的生产,而主要不是为了市场交换和利润;

面向地方需要的地方化生产;

结果的平等;

社会与环境公正;

相互支持的社会—自然关系。

生态社会主义试图证明,这些主题不多不少也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它们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与条件,而且,它们恰恰是解决晚期资本主义产生的环境与社会难题所需要的。因而,结论应当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它们在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相关性。但我们需要记住,我们正在谈论的是基于上述原则的、组织物质生产和社会与文化生活的一种新方式,而绝非是过去错误地自称为“共产主义”的国家专制体制的等价物;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且基于本书中讨论对象的原因,这需要一种把动物、植物和星球生态系统的其他要素组成的共同体带入一种兄妹关系,而人类只是其中一部分的社会主义。

戴维·佩珀

2004年7月于牛津布鲁克斯大学

第一版前言

当 1992 年全球高峰会议在里约热内卢闭幕的时候，我完成了本书倒数第二遍的草稿。乔纳森·波里特（Jonathon Porritt）——英国绿色运动最知名的发言人——宣称，他是怀着很低的期望去参加这次会议的，结果果不出其所料。本书着重阐述了波里特怀有很低期望之所以是明智的某些原因。

许多绿色分子宣布，他们对高峰会议贫乏的成果感到失望。这意味着他们曾在某种程度上期望，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牺牲它们财富的一大部分尤其是获得财富的手段来帮助最贫穷国家，以保护它们为了在世界体系中生存和发展而必须破坏的环境。然而，我们都应该意识到，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欧共体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它们如果不根本改变其性质，就**不能**以认真而持久的方式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揭示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同时，它也主张一种走向激进选择性的经济和社会安排的变革，一种类似于一个真正的地方自治主义的“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概念所要求的变革。

还有很多绿色分子可能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中**有用和有趣**的事情，在此，我将努力把它们概括出来。我也将描述无政府主义对当今绿色政治哲学的影响，并指出这种影响中的哪些因素应该保留和哪些因素应该抛弃。本书的目的是概述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分析，它将提供在绿色议题上的一种激进的社会公正的和关爱环境的但从根本上说却



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

我认为，绿色运动目前所需要的正是这种观点，而不是它现行的“生物中心主义”的和政治上散漫的方法，以便引起许多仍被绿色运动疏远或对它漠不关心的人们的关注。而且，撇开实用主义的理由不谈，我认为，不允许我们对非人自然的关切代替或超过对人类的关切是重要的。一些绿色分子相信，我们应该基于自然的“内在价值”而不是它对（所有）人的价值去保护和尊重自然，无论这种价值是什么。我很难认同这一点。我认为，社会正义或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缺乏是所有环境问题中最为紧迫的。地球高峰会议清楚地表明，实现更多的社会公正是与臭氧层耗尽、全球变暖以及其他全球难题做斗争的**前提条件**。

所有这些都是本书要传达的政治信息。然而，说教不是它的主要目的。它的目的是尽可能清晰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关于什么的学说，以及它们和一些由绿色运动提出的最紧迫的政治议题的相关性。

本书主要是面向各学科中的学生以及那些对绿色运动感兴趣但不是专业学者的读者。本书旨在清楚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那些最初不一定为这些读者而写作的人们的**思想**，它产生于我准备对《现代环境主义的根基》（以下简称《根基》）进行一个重大修订的新版本的努力。在勘定了自第一版发行以来收集的一些注释之后，我估计到，我很可能需要大约 33 多万字来表达所有这些内容，但（非常不合理的是）出版社不允许增加这些内容。因而，这促成了我对那本书的第六章和第七章内容的进一步思考。

本书一方面不打算涉猎像《根基》那本书那样的广度或范围。它假定，读者已经了解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关注点和方法的某些内容。这种观点已在《根基》中得到了简短的论述，而在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的经典之作《绿色政治思想》中得到了十分全面的阐述。另一方面，本书也不打算全面地阐明政治生态学和生态政治学的所有可能的根基（一些最近出版的书已经做了这些），而是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和



无政府主义。而且,在这些界限内也存在着更进一步的限制。例如,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只是被列举出了它的基本内容,尽管我必须承认,生态社会主义主要而迫切的任务是抓住绿色运动经常回避的棘手问题,抓住绿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细节**。而且,在讨论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变革中的代理人和行为者时,我坚持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持续重要性,但没有论及同样重要的在任何集体性激进运动中自我雇佣者或管理者阶级的作用等议题。不仅如此,本书主要是关于理论的,尽管一个篇幅更短但包含着**做什么的**可行性建议的卷本也许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并且我曾听到读者问道:这类著作中正变得越来越普遍的女性主义观点的讨论在哪儿?

我承认,我希望本书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而这些缺陷当然不是下面我要感谢的帮助过我的人们的过错。在一系列的可能之中,我不能确信应该选择哪一个。是因为篇幅不够吗?我想,我喜欢这样一种理由,即这些想法可以成为一个未来讨论议程上某些可能的条目。毫无疑问,我仍有许多需要学习和思考的地方。当然,绿色运动内部及其周围的其他人也是如此。

我通过写作《根基》学会了某种方法,它可以超出预料地被更好地接受和更广泛地应用。但是,一些绿色批评者憎恨它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我希望,我可以通过这个更充分的、更让人满意的论述来赢得他们。我希望,本书将有助于我们所有人深化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所谓的“世界新秩序”已经表明了它仅仅是一种对人和自然剥夺的新秩序)。

在此,我要对下面这些人表示感谢:亚当姆·别克(Adam Buick)、戴维·埃利奥特(David Elliot)、尼基·哈勒姆(Nickie Hallam)、吉姆·奥康纳(Jim O'Connor)、菲尔·奥基夫(Phil O'Keefe)、克里斯·帕克(Chris Park)、理查德·皮特(Richard Peet)、格雷厄姆·珀切斯(Graham Purchase)、比弗·肖(Biff Shore)、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们或者提供资料,或者对本书部



分内容提出批评，或者鼓励我批判地思考一些具体观点，这些都构成了本书的特色。我也十分高兴能听到英国社会主义党讨论会的许多录音。我发现，这些录音信息丰富而且富有挑战性，它为人们作出了一个重要的贡献。因而，我将它们推荐给那些希望从社会主义者本人而不是仅仅从更加分散的和较少趣味的学院教科书中了解社会主义的读者。

第四章第四节的后一部分，最初作为一篇文章发表在《掠夺》(The Raven) 1988年3月的第1期上；第二章第三节选自于一篇即将发表在《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上的文章。

戴维·佩珀

1992年于牛津

目 录

第一章 红与绿：旧政治还是新政治	1
1. 红绿之争	1
2. 某些旧政治问题	9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绿色分子、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定位	37
1. 生态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	37
2. 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42
3. 环境主义和传统政治意识形态	51
4. 绿色政治是后现代政治	63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环境主义	70
1. 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相关性	70
2.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79
3. 资本主义的分析	91